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DANG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GuDai WenXianXue De

WenHua ChanShi

古代文献学的 文化阐释

王国强/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

王国强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王国强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10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ISBN 978 - 7 - 5013 - 3745 - 3

I. 古… II. 王… III. 古文献学—中国—文集

IV. G256.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0380 号

书名 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

著者 王国强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125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745 - 3/G · 754

定价 48.00 元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 主编:吴慰慈 陈源蒸
- 编委: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 郭又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审
-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
- 倪 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
-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徐引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总 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30年。30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入图书馆学的殿堂。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考证古籍版本、研究藏书目录有什么用呢?这些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

繁荣了学术文化。考证古籍版本,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思想;探讨藏书目录,有利于了解各时代藏书情形,也对今天的藏书建设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从藏书、目录、版本等研究出发,还可以推荐图书、指导阅读。这几位中有不少致力于这种研究,也有不少还在致力于这种实践。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更应当探讨如何让这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给人们的便是学会如何在浩瀚的文献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拥有这种本领和能力将会终身受用无穷。如果读者能从图书馆了解到怎样读书、有哪些书可读、书以哪种版本为好、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哪些书需要精读、哪些书只需浏览,这样,就可以说图书馆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中充分发挥了文化教育的功能,也可以说我们的文献学、目录学研究并非全然虚不可用。文献目录之学本来就是致用之学,而其所致之用,应该说正是这些方面。

这些中青年学者是正在成长中的大树。他们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吸取养分,并逐渐枝繁叶茂。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而图书馆事业也因他们的研究而变得生机勃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终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顶梁柱。是为序。

彭斐章

2008年2月于珞珈山

序

我与王国强教授相识 20 余年,深切地感到他的学问和识见不断增长,学者的品格日渐成熟。睹其人,读其文,闻其论,每每为他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所感动。

国强的主要学术领域是古代文献学,在古代文献学学科建设及目录学、版本学和历史藏书学等方面都有令人称道的建树。

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古代重要的目录学命题,国强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显示出他不断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的求真精神。《“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一文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对于其长处和局限最早进行了系统分析,它告诉我们,这个命题的价值并不像以往所有的研究那样,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必需加以分析才能明了的。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出应对中国目录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新的文化形态与传统之间达到辩证的衔接。文章试图突破传统的所谓精华和糟粕的两极分野而更多地采用分析的方法研究目录学传统和传统目录学;他研究传统目录学的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对当代目录学的关怀,是认清传统目录学的真谛,建设和发展中国目录学。

国强前后花费 15 年时间,着力于明代目录学研究,并于 2000 年出版《明代目录学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中国目录学之断代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强对于中国历史藏书学的研究,也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独到的见解斐声学林。关于政府藏书管理机构和藏书机构,他有《历代政府藏书管理机构考略》、《明朝皇史宬始末及其特点》和《明代文渊阁藏书考述》等文章。《我国私家藏书起源试探》讨论了先秦私人藏书活动,《中国藏书史辨误三题》可视为前文的姊

／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

2

妹篇,澄清了古代藏书史研究中几个常见的错误:一是“书不可胜载”的“载”字,文章认为当解作“记载”;二是研究者往往引用《庄子·天下篇》中“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一段话作为孔子是藏书家的证据,这是把传说当作信史使用的典型,因为庄子十九寓言,原是不足为训的;三是不少人至今还在说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可谓皮相之极。他的分析和辩驳,给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因为,这些误解,不仅是知识性的,而且更涉及学风建设问题。

国强一直关注中国文化的建设,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他以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研究为基点,提出了许多问题,发人深省。《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认为典籍是文化传承的最主要渠道和表现形式。典籍的收藏是一个民族,尤其是藏书家的文化自觉。文章从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地位、文化理念、文化品位和藏书的地理变迁所反映的文化意蕴等方面揭示了古代藏书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文化的创造与延续:一种深刻的觉醒》一文对现收藏于铁琴铜剑楼的元刊《资治通鉴》一书的流传、阅读、题跋的过程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讨论。《“儒藏说”评析》全面讨论了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儒藏说”的源流、内容、背景、价值和实际影响,是迄今研究“儒藏说”的最权威的文献。鲁阳对于编纂儒藏,一直持保留态度;读国强文章,顿悟不可轻易否定一个人,不可轻易否定一个学派,也不可轻易否定一种观点。凡事应取分析态度。

1999年至2001年3年之间,我与国强走遍大半个河南,访求秘籍遗珍,从此,他对版本学的热爱,也一发而不可收。在版本学领域,国强的成果,也相当可观。

《从〈金瓶梅词话〉看明代的“书帕”本》以《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两部话本小说关于“书帕”的描述为例,讨论了“书帕”本的真相,纠正了前人记载的偏颇。《论坊刻的历史地位和文献价值——兼论文献的综合评价问题》(合著)认为,“版刻质量的高低优劣只是衡量不同刻书系统质量的一个层面,从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而言,甚至不是主要的层面。如果仅从版刻质量入手进而认为‘坊刻各方面都不如官刻和私刻’,则不免缺乏鸿

通”。文章主要从文献价值的角度对坊刻作出新的评价,其结论是坊刻和官刻、私刻具有同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基本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可谓一反传统的平实之论。

国强先后对曹之教授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两部著作发表过两篇书评,对版本学和印刷术研究的现状及其应该努力的方向、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版本学学科建设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汉代文献学研究》是国强的博士学位论文。两汉 400 余年间,文献活动频繁,在借鉴先秦文献编纂、整理成就的基础上,在文献事业的各个领域都有创获,综合运用文献学各种方法,展开了文献的系统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凸显了文献学的重要地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实际源头。同时,汉代的文献整理活动及其成果深深影响着汉代政治、社会、思想、学术、文化,构成汉代学术的主体。对汉代文献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汉代文献学研究》涉及文献学的所有重要方面,充分显示了作者全面而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广泛而深刻的学术背景。

国强饱读文献,网罗古今,追求会通,给人以一种历史的深邃和丰富感。同时,学术研究,必然有方法论问题。优秀学者与一般学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觉地寻求先进的科研方法而运用之,是以常收事半功倍之效。国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扎扎实实地从事学术探研,而且还在方法论上下工夫。

国强曾有《学者不可太急于自售》之作,他说:“学术是一种清冷的事业,置身其中,必须抱有持敬、坚定而深远的心态。”国强长于涡河之畔,深得老子“上德不德”、“无为以为”之要,此诚人所难能。

兹当王国强教授自选集付梓之际,用赘数言,以示欣企之意。是为序。

萧鲁阳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目 录

中国古典目录学新论	(1)
中国目录学基本精神探论	(14)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5)
略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特质	(32)
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史论纲	(40)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	(51)
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的互著法和别裁法	(66)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75)
关于《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两个问题的探讨	(86)
论郑樵目录学思想	(94)
明代私家书目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及其成就	(106)
论《国史经籍志》	(117)
《宝文堂书目》及其文献价值	(128)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地位	(134)
20 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	(151)
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	(162)
我国私家藏书起源试探	(173)
明代藏书事业历史背景探论	(183)
明代政府藏书概述	(191)
明代文渊阁藏书考述	(200)
“儒藏说”评析	(209)
中国古籍版本学是能够辉煌起来的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读后	(219)

汉代文献学的特点及其对汉代学术的影响	(222)
汉代文献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	(234)
论汉代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	(243)
从《史记》看汉代的文献传播过程及影响因素	(253)
汉代文献注释模式研究	(260)
主要论著目录	(271)

(1)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4)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25)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35)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40)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42)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66)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72)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88)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94)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06)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17)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28)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34)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41)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65)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71)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83)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91)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200)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205)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210)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中国古典目录学新论

引言

中国古典目录学作为整体已然终结一个半世纪,当代目录学也有长足进步;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认识水平上,古典目录学之于我们都有明显的距离感,这给我们提供了更客观地认识它的条件,冷静和审慎能使我们避免或减少失误。我们怀着对目录学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深切关怀,既在历史的层次上不苛求古人,又在思想的层次上对之作严格的批评;一方面,我们对古典目录学内在的局限与受其影响到现在仍然呈现在目录学界的诸多混淆加以说明,另一方面,我们对其实际内容作出合理的批评之后才易不受其影响。

古典目录学不同流派并存,是一元多向的,这是我们认识的起点。只有对古典目录学作比较研究,我们才能把握住整体和局部,主流和支流,从而深察其嬗变之迹。

然而多年来,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看到的只是一副面目,在研究的繁荣背后呈现着难堪的沉寂和雷同,贫乏和苍白。“我注六经”式的研究中所耗费的大量精力却未获致多少有效的成果,少数学者在该圈子内通过卓越追求而取得的有限成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时钟基本上停滞在以清代目录学价值观念为基本内容的本世纪上半叶。这种失误的根源在于人们否定了古典目录学的一元多向性而仅仅选择了学术性书目多种功能之一——辨考学术源流的价值取向,无视书目和目录学的多种功能和作用,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书目和目录学主要甚至唯一的功能价值作用,以之为不可违越的教条,构造了一个自我封闭系统,其他类型的书目及其理论概受粗

暴的排斥或轻视。不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中国目录学,时事几易星霜,成见依然故我。也许人们偶或记得书目具有记载文献提供检索的功能,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它降到次要地位。

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即作为工具书,记载文献和提供检索是书目基本的功能,这个功能适合于一切书目,并且不排斥各类书目的特殊功能。任何理论(体系)都必须接受这个功能的检验。

本文把古典目录学作为发展着的有机体进行研究,论述了关于古典目录学理论和实践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如下几个主要论点:第一,各个流派的古典书目都有价值,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有一些缺陷或不足;第二,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内容的古典目录学认知只有置于目录学理论之中才有价值,由于古代目录学家把它作为目录学理论本体,不仅损伤了其本身价值,也陷入了绝对化的失误;第三,对书目检索功能的认知是古典目录学理论中较具价值的内容;第四,作为整体的古典目录学是客观存在的,且有自己的特点。

古典目录学实践

本文依编制目的、所揭示的文献信息量和编制形式等综合标准,拟将古典书目分作学术性书目、藏书性书目和简明确目三种类型。具体说,具备类序、提要 and 篇目体制三者或一者为学术性书目,无三体制而仅著录基本项目者为藏书性书目,在藏书性书目基础上增加必要的注释者为简明确目。

学术性书目是通过记载文献提供检索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表明它具有两项功能,在达到书目基本功能——揭示文献提供检索——的基础上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既拓展了书目功用范围,也超越了一般书目。由于过分关注于第二功能,学术性书目在编制方法和指导思想存在着诸多缺陷。为强求一律,对于三体制的使用不加节制,不视具体情况;轻视文献外形特征的揭示,书名项以外的基本项目多湮没于提要之中,不便检索;编者总是根据政治风云或私心己意率尔批评和取舍文献,不能保持客观性;对于学术史的叙述比较片面、散乱,但也比

较具体,不能不受书目形式的限制。这些都影响了书目基本功能的发挥。如何处理好两个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功能,使二者完美地结合于书目一身,古人并未作深切的努力。

藏书性书目着重于文献外形特征的揭示,著录内容比较简略,而在实际编纂中常常项目不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目功能的发挥。在书目编制方法上,真正对中国书目编纂的进步贡献较大者是藏书性书目,著录事项的增加和有序主要是由它完成的。正因为著录简略和直观,才为上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简明书目通过对文献外形和内容特征的全面而简明的揭示,较好地发挥了书目基本功能。^①古代简明书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自身发展的不充分,名实并不完全相符,尚有诸多不足。

尽管三者功能、编制方法和著录内容上有些差别,但它们同属分类目录。古典书目只有分类目录一种形式,这种一元多向表明古典书目的单薄。下面我们将超越具体类型的书目,对古典书目编制方法和著录内容作一述评。

书目著录的第一步是确立标目。古典书目以书名标目为主,间或有以著者标目者,这两种标目方法均无不可。古典书目著录的基本事项经历了由简单至复杂、由阙略到齐全、由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大抵唐宋以前书目著录内容包括书名、卷(篇)数、撰人时代、姓名、著作方式,或提要。宋代萌芽了版本的著录,但仅限于何种板本。明清二代增加了稽核项,内容包括书的套数、册数、函数、全阙以及所阙何卷何册等,其他项目也有所补充,如版本项包括出版时间、地点和版本类别。宋代以降,提要项和注释项有所发展,内容和形式渐有扩充。各项顺序也越来越秩然,大抵遵循书名项、著者项、版本项、稽核项和注释项的顺序。这当然是就整体和总趋势而言的。实际上,在各别书目中,上述各项既不全,顺序也多有凌乱。古代从无关于著录事项及其顺序的探讨和规定,^②往往是约定俗成,随着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特征认识的加深以及编目经验的累积逐渐进步。

古代提要和注释方法较有成就。提要体裁有叙录体、传录体和辑录体,其宗旨有内容评介、汇辑资料和文献考订,其内容有着作大意和主旨、成书经过、著者生平及其学术思想、评价是非以及

// 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 //

4

考证,这些体裁、宗旨和内容在不同书目中为了达到编者不同的目的而被灵活运用着。在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特征的揭示上,注释更是方法多样,灵活运用,文字简要,很有价值。

互著别裁法是古代著录方法的另一成果,^③是著录方法的长足进步,可使书目更能成为一有机整体和有效的检索工具。

古典书目的格式多是以大字书写标目,各项之间多以空格分开。此外还有表格式著录。表格式本是为了依项目登录藏书,或省去不必要的繁文,客观上却使各项更为直观,有助于提高检索效果。它一般分作上下两层,上层记书名,下层或一行或二行,记卷数、册(套、篇)数、撰人时代,姓名,以及版本、细目、附录或注释。

在类分图书时,古典书目主要依据内容而辅之以题材,其实体现了依图书主要特征类书的标准。古人设置类目首先考虑的是图书而非学科,有些书籍就依其题裁归入大量的辨体类目中。在既定图书中,类目越详尽则同类书越少,反之亦然。尽管古典书目类例比较粗疏,但由于同类之书无多,所以同类书的编次并未引起重视。不过为了查检的方便,人们会自觉注意及此,书次并非随意排列。显然,若无书的有序排列配合,再好的检索途径也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中同类书的排列已较秩然,^④但标准既多,例外的情况也不少。一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较好地解决了同类书排列,即以时代为次,特殊情况则稍作变通。

古代书目组织款目的方法只有类例(分类法)一种。古代书目类例有三种类型,即《七略》法、四部法和其他法。《七略》法流行于汉代,魏晋六朝时,四部法产生并取得统治地位,成为后世书目的通用类例。中唐以后,四部法因为体系的限制无法容纳新产生的书籍,因新增类目而脞杂不伦,^⑤表明无能为力的四部体系实有被突破的必要。因此宋代以降,创新类例者代不乏人,至明代遂成时尚;这些创造符合了历史趋势,并取得了实际成果,而且呈现着逐渐发展的趋势。然而它们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四部法对抗。终于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挟带着阴冷的雄风摧毁了这个年轻的生命,也最终失却了在古代社会晚期

建设符合当时学术和图书实际的书目类例的机会。《总目》类例之所以在近代以后尚有很大影响,不是因为有多突出的优点,而是没有较好的类例替代它。我们可以说,中唐以后,古典书目类例在体系上就基本上脱离学术和图书的实际了。

古典书目类例的设置过分追求形式的整齐,即追求各部类图书数量多寡的大体一致,避免“多寡不均”,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四部法。四部法的产生就是某些类书多而另外一些类书少予以增删合并的结果,这样做符合了图书数量多寡的实际,但作为主要的立类原则显然是有缺陷的,它应当同其他原则结合起来,互为补充。这种思想的深刻根源是传统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对称和均衡,而“四”又是对称的集中体现。企图以类例达到“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的目的而不顾其他原则,同样偏执一端。古典书目类例还被赋予相当浓厚的思想性色彩,而不是首先从学术的角度考虑问题。尽管类例是唯一的检索途径,人们却不以改善检索途径或使类例更符合学术和图书实际作为出发点。“思想性原则”对类例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都是不利的,是浅薄、迂腐并且基本上是反科学的。上述立类原则的认知是局部的、浮浅的,而各自偏执一端,使类例发展步履维艰。

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为人忽视的事实,这就是古代书目类例中还有标识符号意义的创造。它把文字和类目相匹配而形成完整的类例系统,作为创造者的明代目录学家选择了广为人知的《千字文》。《千字文》是隋唐以来最为流行的启蒙读物之一,把一千个不同的常用字编为四言韵语,字序固定且便记忆,以一字表示一类,自然就表示了类目次序。这样的文字系统恰恰适应了古代书目类例并不复杂的实际。这标志着古代书目类例在某一阶段的全面发展,也是科学的类目标识符号产生(在中国是引进)之前的尝试和准备。^⑥

古典书目的唯一形式是分类目录,唯一的检索途径是类例,一片阴柔的和平,犹如荒野中的玫瑰伴着秋风的吹拂独自叹息。古代所产生的按韵编排的字典和类书,按韵编制的人名索引,为主题目录和字顺索引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可能性。^⑦但这些可能性都被中国文化和目录学本身所吞噬。熟读精思的学风,短篇考订

／
／
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
／

的学问,对工具的轻视,使人们把工具书视为投机取巧的东西。编目为了方便自己,而自己又熟悉藏书,那么区区数千百种书编辅助索引真的有必要吗?还不应忘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被视为书目主要甚至唯一功能,除却能达此目的的分类目录(尤其是学术性书目)外,任何与此功能无关的书目种类和检索途径绝不会激起人们的探究兴趣和热情。很少有人把书目编制视为学术活动,只是依惯例编目罢了。中国文化背景不会提供产生其他类型书目和检索途径的沃土,我们原不必也不应深责,但我们也不能不怀着深切的关怀反思中国文化和中国目录学传统。

古典目录学理论

古典目录学理论产生于中古时代,此后续有发展,终究没有产生出比较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其内容多是关于目录学局部经验的总结和书目方法论,这是知识积累时期和经验科学时期,人们的注意力局限于书目本身而尚未顾及较高层次的研究,其成果单薄、缺乏系统性甚至不科学也是自然的,这种封闭式研究正好适应了古代学术的氛围,作为一个甚至不被人从理论上承认是独立存在的小学科,当然不可能成为出墙的红杏。

古代没有谁正面承认过目录学有独立的地位,往往被视为校雠学的一部分。章学诚甚至鄙夷地声称那些认为有目录学的人是“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从《通志校雠略》到《校雠通义》都是在校雠学的范围内论述书目和目录学(此就实际而言),或者是把目录学作为学术史研究的附庸,“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命题揭示了这个倾向。这些意向和结论得自于部分学术性书目,不能涵盖书目整体,缩小了书目概念的外延,也不符合书目实际。

古典目录学从未陷入思辨化的境地。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所以如此,除却中国文化背景外,关于目录学本身则可作如下说明:第一,目录学理论多是在书目批评中产生的,或是从个人编目经验中总结出的,其结果自然多是局部的描述和书目方法论;第二,由于目录学不被视为独立的学科,理论研究受到限制,很少有人为之付出深切的努力;第三,书目编制几乎成为最终目的,人们在接受这种单一的书目种类和检索途径传统时便丧失创造之欲,